三秦印记

从听诊器到建言书的四十年足迹

□ 李和平

我书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1989年，我穿着洗得发黄的白大褂，推着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站在陕西省榆林市府谷县医院三排小楼前，几只羊站在旁边光秃秃的沙梁上。那是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府谷县医院工作的第一年，时值神府开发初期，风沙与浓烟是这儿的“主旋律”，哪怕紧闭门窗，病历本仍能落满一层细密的黄沙。

那时的府谷县医院，与其说是医院，不如说是个大点儿的卫生所，烧煤取暖、开窗纳凉，至于医疗设备，就是几台老掉牙的X光机、几台显微镜，药房里的药品种类稀少，青霉素是宝贝，还常常断货。我记得最清楚的是1990年冬天，一位来自赵五湾乡的老乡，赶着借来的毛驴车，拉着高烧昏迷的儿子，在零下15摄氏度的寒风里跋涉了5个小时才到医院——在此之前，孩子已经在村上赤脚医生家里救治了一天一夜，得的是急性肺炎，送来得又迟，急需抗生素，药房告罄，我们几个年轻医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最后是主任骑着他的自行车，顶着寒风，挨个敲开城里几位老医生的家门，才凑齐了几支救命的青霉素。孩子得救了，老乡几天后又赶着驴车来，带来一只杀好洗净的整鸡——那本来是他除夕夜准备的年夜饭。老乡殷切的目光和窗外刺骨的寒风，在我心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缺医少药，是悬在榆林百姓头上的一把刀。

改革春风吹满地，最先吹暖了物质的寒冬。20世纪90年代初，医院开始尝试引进设备。第一台B超机运送来时，全院轰动，机器操作复杂，说明书还是英文的，老主任请来了县中学的英语老师，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标注意思。第一次给一位孕妇做出清晰的胎儿图像时，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人，“看见了！真看见了！娃在里面动哩！”那一刻，我感受到科技带来的不仅仅是精准的诊断，更是希望的曙光。

真正的巨变发生在2000年以后。伴随着陕西经济腾飞和榆林能源发展，省市县政府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前所未有。我们搬进了宽敞明亮的现代化大楼，螺旋CT、磁共振、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先进的设备接踵而至，手术室里无影灯柔和的光线洒下来，层流系统无声地运转，那种感觉，是难以言喻的激动和踏实。我们开始大规模引进人才，送各年龄阶段的骨干去北京、上海、广东进修，老百姓曾经需要千里迢迢外出求医的复杂手术，如今在家门口就能解决。

变化更发生在乡镇。早年间去村里，卫生院“老三样”——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计，外加一个蒙着灰尘、几乎闲置的消毒锅。村医多是“赤脚医生”出身，靠经验看病，药品匮乏。村民既没钱，又缺乏就医意识，小病硬扛、大病看命。有一次，我回老家看望亲人，村头正在办丧事，黑白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性的脸，一问才知，叫了产婆接生，谁知难产大出血，送到卫生院时，人已经不行了……

新医改和乡村振兴战略，像两支肾上腺素注入了基层。标准化建设的门诊楼、住院部拔地而起，旧貌换新颜。国家配备了基本的诊疗设备：心电图机、彩超、血球分析仪、B超机……更重要的是，“县聘乡管村用”的模式落地了。我再次回老家时，村卫生室窗明几净，产科医护人员忙忙碌碌，三位年轻的医学院硕士毕业生正熟练地操作着电脑，为适龄女性村民建立电子健康档案。远程诊疗更是跨越了沟壑，我有一次在神木市的一个乡镇卫生院，亲眼看到电子屏幕小框里的榆林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专家，正在为留守老人看脑电图，清晰又通俗地说出病症和治疗方法，老人布满皱纹的嘴咧开笑容，又小心翼翼地询问旁边的医生，要花多少钱治疗，不行放弃算了，护士忙说：“有医保呢，专家线上诊疗不收费，你的治疗报销下来花不了几千。”看得好病、看得起病，不就是老百姓最朴素的两个心愿吗？

2020年，我当选民革榆林市委会主委，同时兼任政协委员。这份沉甸甸的责任，让我得以从另一个维度参与和见证榆林的发展。三重身份，成为我连接医疗本职与更广阔社会民生的桥梁。

我们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建言献策必须脚沾泥土、心怀真情。我们组织党员中的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深入田间地头、厂矿车间、社区街道，不是走马观花，而是蹲点调研，与老百姓坐在炕头上拉家常，听他们最真实的声音、最迫切的诉求。

在医疗领域，除了前面提到的村医队伍建设问题，我们还持续关注着基层医疗的痛点。在一次调研中，我们发现尽管医疗政策已尽力惠及百姓，但村镇医疗卫生人才梯队建设和资源的配比仍旧未达到预期，甚至部分三级医疗网络在实施过程中流于形式。回去后，我们立即提出了《关于加强村镇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提案》，明确给出建立统一的乡镇卫生服务中心，建立对口医院带动村镇卫生服务中心制度，联合开展集康复养老保健为一体的特色诊室，对在下乡工作中、双向转诊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医务人员，返回医院后应给予奖励，职务任命时应优先考虑提拔等具体可行的建议，卫健部门积极回应，随后三个月逐步推动了相关建议的落实和资源倾斜。

在乡村振兴的大课题中，我们的关注点更加广泛。前些年，我们组织专家前往南部山区调研，发现满山的羊啃食着远志、黄芪，一问老百姓才知道，家家户户都种中药材，但是卖不上价。我们联系到中医院专家，得知我市有丰厚的中药资源，但在中药材的生产、开发、保护等产业发展方面科技支撑作用不足，发展落后。综合老乡、专家的意见，我们提出《关于创建中医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提案》，建议筹建中医药市级重点实验室，高薪引入中医药高层次人才，组建一流科研团队，发挥陕西榆林的中医药优势，解决地方性疾病和榆林优势中药材的科研问题。这份建议被列为市政协督办的重点提案，推动一些县区在中医药政策支持和模式创新上进行有益探索。

履职的成效不在于提案数量的多少，而在于是否真正推动了问题的解决，惠及百姓。当我看到，经过持续呼吁，一些偏远村子的卫生室配上了年轻的专业村医；看到乡镇养老院里，留守老人们“攀比”着谁看病花的钱少；看到中药材价格上涨，收益真正落到农民手里；看到我们的建议被吸收进政府的相关规划文件里……那一刻，医生、民革党员、政协委员的责任感和价值感油然而生。我更深切地体会到，参政议政不是空中楼阁，它根植于深厚的泥土，最终要回馈这片土地上的人民。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我的交通工具从“二八”大杠自行车换成了汽车，工作地点从沙土环绕的三层小楼变成了现代化的医院大楼；目光所及，这座陕北小城从一座“风沙之城”蜕变为高楼林立、绿树成荫的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脚下的乡村，从闭塞贫困走向了通路、通水、通电、通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新天地。

回望来路，那些记忆深处的画面依然鲜活：老乡送来年夜饭时颤抖的双手；失去妻子的丈夫痛哭的声音；B超机里第一次清晰显现的胎儿影像；远程诊疗屏幕上老人信任的目光……这些细碎的片段，串联起陕西一个小城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波澜壮阔又细腻动人的变迁史。我何其有幸，能以一名医生、一名民主党派成员、一名政协委员的多重身份，亲历其中、参与其中、见证其中。从听诊器到建言书，变的是岗位和视角，不变的是那份对脚下这片黄土地的深情，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信赖。

展望未来，三秦发展之路依然漫长。如何让乡村振兴的步伐更加稳健扎实？如何让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更加优质均衡？如何守护好这片正在变绿的脆弱生态？这些都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新考卷。我深知，无论是握着听诊器守护生命，还是拿起笔书写建言，肩头的责任从未减轻。我将继续在这条路上前行，用脚步丈量民情，用专业守护健康，用智慧建言发展，与所有奋斗在这片土地上的榆林人一起，共同书写下一个更加精彩的“三秦故事”。因为这方水土、这群百姓，值得最美好的明天。

（作者系省政协委员、榆林市政协副主席）

文史馆的故事

一段跨越山海的典籍归程

——十五册《人民手册》从德国柏林重回三秦文史殿堂

当十五册泛着岁月柔光的《人民手册》整齐码放在陕西省政协文史馆的案头时，一段横跨七十载光阴、辗转欧亚大陆的漫长旅程最终落定。纸页早已褪去初印时的亮白，晕染出时间沉淀的蜜色肌理，边角留着被反复翻阅的细碎磨痕，书脊处的装订线仍紧实工整——这些诞生于新中国建设初期的年度典籍，曾跟着东德专家的脚步远赴柏林，又因一盆君子兰的机缘辗转到德国华侨马瑞臻手中，如今终于跨越山海，回到了它曾一笔一划认真记录过的土地上。

此次捐赠的十五册《人民手册》，出版年份覆盖1950年至1979年，完整串联起新中国成立后近三十年的建设轨迹。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由权威机构编纂的年度综合性资料工具书，《人民手册》兼具官方权威性与社会普及性，系统收录了对应年度的国家大政方针、经济建设统计数据、社会民生发展动态、文教卫生领域成果及各行各业规章细则，大到国家发展规划，小到民生日用参照标准，均有翔实记载，是当时社会各界了解国情、对接政策的核心案头读物，也堪称记录时代变迁最直观、最鲜活的“纸上年鉴”。本次捐赠的十五册《人民手册》，存续完整度较高。从出版主体来看，十四册由上海大公报编纂出版，另有1979年版一册由人民日报社出版，清晰映照出该典籍不同历史阶段的编纂出版脉络。整套藏品时序连贯，整体品相保存尚好，虽历经跨国迁徙与半个多世纪的时光淘洗，仅个别册页留有边角磨损、少量书页脱落的岁月旧痕外，并无大规模散佚缺损的情况，在同期传世史料中实属难得，为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初期的建设史、社会生活史与对外交流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一手实物史料。

这套书的第一位收藏者，是一对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东德工业专家身份派驻苏联驻华大使馆工作的德国夫妇。在华工作的岁月里，他们亲眼见证了这片土地百废待兴却蓬勃向上的面貌，《人民手册》便成了他们系统读懂这个东方国度的窗口。从出版第一年起，他们便养成了每年如约购入一册的习惯，一字一句读透这片土地的生长与变化。任期结束返回柏林后，这份牵挂并未因山海阻隔而中断，他们请托北京的友人每年按期购置新书，再辗转邮寄到德国。一册册年鉴跨过国境线，稳稳堆在柏林家中的书架上，成了他们回望中国岁月的念想，也成了两个国家、两种文明相知相交的静默见证。

缘分的转折，始于柏林社区群里一则寻常的花木领养启事。那对德国夫妇发帖称，家中有多盆从中国带回的君子兰，相伴他们多年，如今年事渐高、精力不济，愿为它们寻觅一位懂花惜花的新主人。马瑞臻刷到消息的瞬间，心底蓦地一动。作为常年旅居柏林的华侨，那株来自故土的花木像一缕遥远又真切的乡音，牵动了她深埋心底的桑梓情思。她当即联系了老人，如约登门领养。

初见那日，君子兰在临窗的花架上舒展着油亮挺拔的叶片，沉静温润，一如她记忆里国内寻常人家案头常见的模样。递过花盆的间隙，老人随口问起她与中国的渊源，一来二去，话匣子便彻底打开了。从养花的细碎心得，聊到各自横跨欧亚的人生轨迹，聊到老夫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北京的岁月，聊到那些年他们一点点读懂中国的日子。说着说着，老人转身从书房捧出一整排码放齐整的旧书——正是他们珍藏了大半辈子的《人民手册》。指尖拂过泛黄的书封，摩挲着纸页间深浅不一的折痕，马瑞臻心头骤然一震，在异国寻常的民居里，竟藏着这样一套完整、鲜活的新中国成长记忆。

相处日久，老夫妇深知马瑞臻对中国历史的珍视，更懂她血脉里化不开的桑梓情怀。年事渐高的他们，一直想为这套书找个真正懂它、能让它继续发光的归处，而非封存在私人书架上慢慢被遗忘。几番深谈之后，老人郑重地将十五册《人民手册》悉数交到马瑞臻手中。这不是简单的物件转交，而是一份跨越国界的信任，也是一段中国记忆的温柔接力。

接过这套书的那一刻，马瑞臻心里便埋下了一个笃定的念头：“该让它们回家。”在她看来，这些记录着新中国每一步成长的典籍，本就该扎根在它所书写的土地上，让更多国人看见那段滚烫的建设岁月，让历史的细节被好好珍藏、代代相传。为了给这套书找到最妥帖的归宿，她辗转打听、多方咨询，先后联系了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两所高校的馆藏机构。得知中国人民大学已藏有完整的《人民手册》全套，复旦大学也已有半数馆藏，两校虽均表达了接收意愿，马瑞臻却另有思量。这套历经跨国漂泊的典籍，唯有落脚于馆藏更需这批史料的机构，才能最大限度释放它的文献价值与传播意义。正因如此，她没有仓促定下归处，而是继续在业内友人、文史专家间征询问询，慎之又慎地为这套书寻觅最匹配的安放之地。她怕委屈了这套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藏书，更怕辜负了这对老夫妇跨越国界的托付。

几经寻觅，事情终于迎来清晰的转机。省政协委员、省侨联副主席尚小红得知此事后，主动为其牵起这条跨越山海的文化纽带。作为扎根侨界的政协委员，尚小红始终践行“政协走近群众、委员服务群众”的履职初心，常年奔走在联结海外侨胞、对接本土文化阵地一线，把政协的履职触角延伸到海内外同胞的切实需求里。她深知省政协文史馆在史料典藏、活化利用上的专业能力与社会价值，也清楚这批海外回流文献的珍贵和分量，便郑重向马瑞臻推荐了陕西省政协文史馆。作为集文史资料征集、典藏、研究、展示于一体的专业机构，省政协文史馆始终致力于打捞散佚的历史记忆、守护地方文化根脉，尤其重视海外回流文史资料的征集、保护与活化利用。马瑞臻通过多方渠道深入了解馆情后，心中悬了许久的石头终于落了地。这里，就是这套书最好的归处。

为了让这套历经半世漂泊的旧书完好踏上归程，马瑞臻特意找来结实的粗麻绳，将十五册书逐本对齐书脊、仔细捆扎稳妥，小心翼翼收进行李箱最里层，亲自从柏林一路辗转带回国内。万里航程里，她像护着一件稀世珍宝一般守着这摞沉甸甸的旧纸，也护着那份跨越山海、终要归根的文化念想。

七月的古城溽暑蒸腾，连日的晴热把街巷烘烤得燥热难当，省政协文史馆内却因这场跨越山海的相遇，漾开了几分沉静温润的书卷气息。捐赠现场，当马瑞臻亲手将十五册《人民手册》交到馆方工作人员手中时，一段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漂泊，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点。

省政协文史馆馆长任强代表馆方表示，这套海外回流的《人民手册》，不仅填补了馆内新中国成立初期年度史料的部分馆藏空白，更因其特殊的收藏经历，承载着国际友人对中国发展的友好情谊，也饱含着海外华侨心系故土的赤诚担当。省政协文史馆将以专业严谨的态度，对这批史料逐一开展建档整理与分类典藏，并依托专题展览、文史研究、公共教育等多元形式让其“活起来”，让更多人透过这一册册旧书，读懂新中国的奋进之路，也读懂这份跨越山海的文化情缘。

从北京到柏林，从专家的私人书架到华侨的手中，再到文史馆的典藏柜，十五册《人民手册》走过了漫长的归程。纸页虽会泛黄，但记忆不会褪色；山海虽有阻隔，但文脉始终相连。这套书的故事，既是一段民间收藏的佳话，也是一首文化相知的小诗。它见证着国际友人对中国发展的持续关注，承载着海外游子对故土的深沉眷恋，更印刻着政协委员联结群众、架桥铺路的履职温度，最终沉淀在三秦大地的文史殿堂里，继续诉说着关于时代、关于情谊、关于根脉的绵长故事。

（省政协文史馆馆藏部供稿）

文史小百科

我国历史上的极端高温天气

□ 潘春华

逢盛夏高温来袭，人们总感慨酷暑难耐。其实，翻开千年史册，我国自古便频发极端热浪，从古籍文字记载到近现代仪器实测，历朝历代都留下了关于高温酷热灾害的真实记录，对照古今，便能读懂气候变化的脉络。

早在先秦时，就有高温灾害的文字记载。战国时期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记录了夏朝第十三任君主胤甲即位时“十日并出”的持续极端酷热干旱现象：“胤甲即位，居西河，十日并出”，距今约有4000年。又载，夏桀二十九年“三日并出”。其实，“十日并出”和“三日并出”，并非天文实况，而是先民对反常持续高温酷热、烈日炙烤致使旱灾的修辞表达，属定性灾害的描述。

两汉四百余年，正史、简牍、灾异志中多次记载大范围极端高温、大旱酷暑天气，是我国早期高温灾害记载十分密集的朝代。《汉书·五行志》载，汉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天下大旱酷暑，盛夏无雨，持续数月高温。关中、中原河水浅涸，田地干裂，百姓苦于燥热，官府开放山林河湖取水，是西汉早期明确记载的持续性高温灾害。汉和帝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发生特大酷暑，《后汉书·五行志》载：“夏旱，极热，雒阳城中民疫。”持续高温引发暑疫，都城洛阳百姓大批染病，是典型的高温衍生次生灾害。汉末又多次出现反常酷热，甚至暮春便燥热如盛夏，高温叠加蝗灾，加剧天下饥荒，亦是汉末民生凋敝的诱因之一。

唐代，大范围热浪频发，往往热、旱、蝗、疫连锁发生，灾情愈发严重，正史五行志、帝王本纪与文人诗文皆留下大量翔实记载。古人以“大燠”“大热”“炎旱”“暍死”等词记录高温灾害。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关中、中原遭遇大范围酷暑，《旧唐书》记载“大热，道路有暍死”，盛夏烈日炙烤官道，来往行人中暑倒毙路旁，是唐代较早有人员伤亡记录的极端高温事件；唐德宗贞元年间，关中连年旱热叠加，是唐代高温灾害集中爆发阶段；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夏，长安、河南一带大燠大旱，《旧唐书·五行志》载“炎气灼人，渴死者众，粟麦枯槁”，连续数十天晴空无雨，城内井水锐减，街道燥热难忍。酷暑引发严重粮荒，粮价飞涨，百姓流离失所；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六月，关内再度全境酷热，土壤缺水严重，当年粮食大幅减产。除官方史书记载，唐代文人墨客亦以诗文真切描写了高温酷暑景象。唐代诗人王维《苦热》诗曰：“赤日满天地，火云成山岳。草木尽焦卷，川泽皆竭涸。”天地仿若烘炉，河湖枯竭，草木焦黄，写尽极端高温带来的荒芜。贯休《苦热寄赤松道者》云：“天云如烧人如炙，天地炉中更何适。蝉喘雷干冰井融，些子清风有何益。”连储藏冰块的深井都受热消融，足见暑热程度。

宋代有明确记载的大规模热浪达52次，平均每6年一次。北宋初期因处于气候温暖期，极端高温灾害尤为频繁。北宋至道二年（公元996年），夏季持续大燠，多地百姓缺水渴死；南宋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五月“大燠四十余日，草木焦槁，山石灼人，暍死者甚众”；嘉定八年（公元1215年）五月，爆发跨多省极端高温天气，《宋史·五行志》记述：“五月大燠，草木枯槁，百泉皆竭”，河道断流，禾苗焦烂，百姓流离失所。此次极端高温灾害，波及河南、安徽、江苏、湖南等地，出现“行都斛水百钱”的严重缺水问题。

明代高温极端天气灾害频次激增，多伴随大旱、瘟疫出现，史书以“酷热”“赤日”“病暍”等定性描述为主。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燕地“赤日”当空，顺天府各县多人中暑，仅大兴、宛平两县毙命者百余人，酷热持续半月，城中多有暍者沿街卧倒；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江南热浪肆虐，因热死者过多，棺木一度供不应求；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赤日流金，土焦泉涸，都城内外疠疫盛行；霸州河湖枯竭，流民途中暍死者居多。

我国古代有精确气温实测的最强高温，当数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华北超级热浪，被学界认定为近千年最严重高温事件。当时法国传教士宋君荣在北京从7月13日至25日以酒精温度计持续观测，7月25日最高气温达44.4℃，连续六天午后气温突破40℃，这一记录成为研究清代气候变化的重要气象资料。此次高温极端天气覆盖京、津、冀、晋、鲁五地。各地县志记载，墙体被烈日灼得发红，铁器木器触手滚烫，大片林木干枯；京城街道行人常有暴毙，顺天府每日动用牛车运送遇难者，仅京畿12天内约有11400人因酷热而亡。井水干涸，藏冰价格暴涨，乾隆帝目睹灾情，下了一道“罪己诏”，说“京师酷暑，皆因朕躬之阙失，或用人行政之失宜”，并下旨拨款赈灾、掩埋尸骸，严防瘟疫蔓延。

进入近现代，我国气象观测体系逐渐完善，极端高温天气有了精准数据记录。1971年湖北全省高温，鄖县最高气温达40.8℃，十余万人中暑；1999年华北持续高温，北京极值41.9℃，刷新当时观测纪录；2013年长江流域超长时间热浪、2022年川渝地区极端高温，重庆北碚测出45.0℃，数百气象观测站点突破历史极值。

2025年世界气象组织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目前亚洲变暖的速度接近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导致极端高温天气频次逐年增多，高温覆盖国土面积、持续时长均创观测史新高，并对生命、生态系统和经济造成威胁。

对比古今极端高温天气轨迹不难发现，古代极端热浪多伴随大范围旱灾，受灾群体往往缺乏防暑、供水、医疗保障等条件，伤亡更为惨重。现代依托完善的气象预警、水利调配、防暑保障体系、热射病防治，极大降低了高温灾害损失。千年高温史也是珍贵气象档案，警示世人重视气候变暖，当着力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合理增加绿地与水系面积，将高温纳入公共卫生紧急响应议程，科学应对愈发频发的极端高温天气带来的气候风险。